

热点与前沿

上册

——青年文艺论坛 2013

祝东力 李云雷 主编

孙佳山 副主编

文化艺术出版社
Cul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热点与前沿

上册

——青年文艺论坛 2013

祝东力 李云雷 主编

孙佳山 副主编

前言

自2011年6月起，在王文章副部长和中国艺术研究院领导的关心和支持下，中国艺术研究院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所开始举办“青年文艺论坛”，每月一期，迄今已累计35期。论坛以当前最具时代症候的文艺作品、现象、事件、趋势和问题为中心，每期集中于一个专题，力图通过具体问题的讨论，提出新的观点和阐释，从历史的视野和理论的维度把握当代文艺的走向。论坛参加者以青年学者为主体，主办方坚持学术民主的原则，努力营造一个平等、宽松、畅所欲言的研讨氛围。论坛以“专题报告+自由讨论”为形式，强调对话和互动性，希望把论坛打造成一个当代文艺批评的制度化平台，一个知识和理论的生产车间。同时，每期论坛采用现场速记，速记稿由每一位发言者自己加工润色，然后整理、编辑成书。

作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所，我们的意图是：将当代文艺的活问题纳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框架，同时，以马克思主义消化与整合当代各种理论，用当下鲜活的经验和问题激发马克思主义原有的活力。

“青年文艺论坛”在文艺界、学术界逐渐产生了较为广泛的影响，在此基础上，2013年11月16日—17日，我们成功举办了“第一届全国青年文艺论坛”，引起广泛关注。本书即由“青年文艺论坛”2013年的12次专题讨论编辑而成，将其中“第一届全国青年文艺论坛”单独编为下册，而将另外11次讨论编为上册。这些讨论勾勒出2013年中国文艺的一些重要方面，可供研究者及关心中国文艺前沿问题的人士参考。

目录

上 册

青年文艺论坛2013

- 第一期 当前文化语境中的文风问题 /1
- 第二期 现代主义思潮再反思 /29
- 第三期 《归来》：美学批评与历史批评 /63
- 第四期 新工人艺术团：创作与实践 /95
- 第五期 青年亚文化与当代社会思潮 /127
- 第六期 当代大众文化中的美国想象 /159
- 第七期 新视野中的世界与文学
——青年作家座谈会 /191
- 第八期 “窃听故事”与意识形态的表述
——以影视作品为中心 /217
- 第九期 娱乐文化的形式变迁与时代内涵 /247
- 第十期 当前文艺作品的价值观和评价标准
问题 /277
- 第十一期 左翼文艺研究：热点与前沿 /309

下 册

第一届全国青年文艺论坛： 转型年代、青年与中国故事

开幕式 /343

- 第一单元 新视野中的当代文艺批评 /355
- 第二单元 30年中国故事新解读（上半场）/379
- 第二单元 30年中国故事新解读（下半场）/403
- 第三单元 “文艺前沿与未来生长点”（上半场）/427
- 第三单元 “文艺前沿与未来生长点”（下半场）/453
- 第四单元 圆桌会议（上半场）/477
- 第四单元 圆桌会议（下半场）/497
- 闭幕式 /511

附 录

- “青年文艺论坛”的探索 李云雷 /521
- 2011年6月至2014年4月各期论坛目录 /524
- 后 记 /526

青年文艺论坛2013

第一期

当前文化语境中的文风问题

关键词：文风 洋八股 文化自信

主持人：李云雷（中国艺术研究院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所）

时 间：2013年1月24日（周四）下午2:30—6:00

地 点：中国艺术研究院334会议室

编者的话

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我国通用的书面语由文言文转为白话文，现代汉语的形成迄今尚不到百年。1942年，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和各根据地整顿党风、学风与文风，为新中国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文化基础。2011年，我国新闻领域开展“走转改”活动，“改文风”是其中重要一项。文风问题横跨文学史、思想史、政治史诸领域，在中国现代历史上周而复始地反复出现，甚至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的重要环节，它不仅是一个人的语言风格问题，而且与文化、民族、国家的未来密切相关。

当下学术界、文学界的文风问题起源于1980年代中后期的新潮理论和新潮文艺，1990年代以来的专业化、学科化、职业化趋势加剧并固化了这一问题，形成了新的困境。当前，不良文风已经严重阻碍了学术研究和文艺批评的健康发展。

本期论坛集中讨论了1980年代以来学术界、文学界的文风问题，对其中存在的症候进行了批判性的审视，并结合与会者自身实际，以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式进行了深入的剖析。

李云雷：今天的主题是“当前文化语境中的文风问题”。“文风问题”现在大家讨论的比较多。从“五四”以来，文风问题一直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既涉及一个作者写作的语言风格问题，也跟整个民族、国家，跟文化未来的建构有很大的关系。1942年的延安整风，涉及了党风、学风与文风等不同层面；2011年开始的“走转改”，主要是在新闻领域展开的活动，但实际上也不限于此。关于学术和文化方面，好像很少有人专门谈这样的问题，在准备材料时，我们发现涉及文风的文章不少，但真正深入谈文风的文章并不多。今天我们围绕这样一个话题展开讨论，发言是每人15分钟，可以重复发言。下面正式开始吧。

孟繁华（沈阳师范大学中国文学与文化研究所）：我觉得马文所举办的这期论坛非常重要，文风问题由来已久，大家都开始意识到了，但是专门开会来讨论文风，这么多年还是第一次，我们自己的文风都存在问题。我觉得文风问题是国家在一个时期里的文化方向问题，是这一问题在学术和文艺领域里的一个表征。看了发的几个材料，这些材料我们都很熟悉。文风问题，毛泽东讲的比较多，毛泽东讲文风是在20世纪40年代前后，那个时候毛泽东的思想已经成熟了，他的很多著作都完成在那个时期。文风问题的背景应该和王明有关，这些从第三国际回来的知识分子对中国革命具体情况不怎么了解，回来之后乱讲话，毛泽东非常反感。整风、延安文艺座谈会都应该和这个背景有关系，所以毛泽东连续发了很多文章。另一方面毛泽东对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的知识分子的文风也并不完全接受。知识分子经常书写当时的痛苦、迷茫、个人主义，讲个性、婚姻自由，在毛泽东看来，老百姓根本听不懂他们在说什么。毛泽东当时要动用所有的手段，实现民族的全员动员，建立一个现代民族国家，他要达到这么一个目的，一定要整顿文风。这也隐含了一个他非常重要的思想，就是对效率的追求。后来德里克有个非常著名的说法，就是毛要实现一个“转译”，就是情感方式、文风、思想方式都要转变，怎么实现这个转变呢？他想了一个办法，就是走向民间。我和谢冕先生编《百年中国文学总系》的时候，有一卷就是《1942：走向民间》，这一卷是李书磊写的，写得非常好。知识分子到了民间之后，情感方

式、话语方式都发生了转变。这个时候一个重要的现象出现了：过去我们是有了很多文学作品之后才能提出一些理论，延安的时候是先有理论，才产生了一些重要的作品。通过向民间学习，我们有了《白毛女》、《小二黑结婚》等这样一些作品，把整个文学艺术的话语方式全部转变了过来，那个时候的文学艺术，对实现民族的全员动员所起到的作用，我们今天无论怎么估价都不过分。但是后来当然也出现了一些问题，特别是进入共和国时期以后，毛泽东把战争时期的思想带到了和平时期，把延安局部地区的经验放大到了整个中国，国统区、沦陷区解放之后，推行的完全是延安的经验，而且这么多年不变，这就有问题了。

联系当下的文风，我觉得也有一个很重要的背景，我们知道1992年谢冕先生在北大建立了一个“批评家周末”，最先提出来的一个问题就是学院批评。谢先生要强化学院批评，为什么要强化学院批评？谢先生讲，就是为了屏蔽庸俗社会学对文化和艺术的侵入，必须坚持专业的方式来进行研究和批评。当时谢先生提出这个想法，我认为是完全正确的。但谁也不会想到，就像改革开放一样，我们不可能知道怎么会发展成今天这个样子。学院批评也是如此，那时候提出是正确的，但20年过去之后，我们的文风就真出问题了。包括最重要的学术杂志，专业的，真正有价值的，能够提出一些看法的，并且阅读时感到赏心悦目的，这样的文章越来越少，这就麻烦了。现在的学术杂志很多，每年发表的文章不计其数，但是大多是学术垃圾，这和文风、学风是联系在一起的。现在培养硕士、博士越来越多，但有些学校规定要求研究生必须在核心期刊发一篇文章，博士研究生必须在核心期刊发两篇文章才有资格毕业。这是进一步恶化文风的体制上的误导，这个问题太严重了。

我举过一个例子，邓正来先生——今早上去世了，非常可惜，他曾给自己的书写过一个序言，讲什么是“学术的小路”。学术小路，就是跟这个学术体制一定要划清界线。他说后来我到体制里来了，但内在的学术要求和学术信念要求我不能走体制这条路。他对我们有很大的启发，但是能坚持这样做的学人毕竟是越来越少。作为一个学人，我觉得对自己确实应该有要求，参加这个会，也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自我反省、自我检讨的可能，起码今后写文章要有一点自我暗示或自我要求。所以我觉得马文所召开这样一个会议，在当下确实是特别及时的。

李云雷：孟老师联系“讲话”，对延安整风的重要性以及建国后新出现的问题做了分析，并结合当下的学术体制，分析了文风问题产生的根源，我觉得很到位，接下来我们请贺老师。

贺绍俊（沈阳师范大学中国文学与文化研究所）：我对这个会的议题有所犹豫，因为谈文风似乎是现在的一个热门话题，我们的讨论会不会也变成一种跟风的讨论？文风问题是中央提出来的，跟风现象也愈演愈烈。开会前能宪说到一个事情，一个新的美术馆落成，

举办一个很大的美术展览，自治区领导班子全部成员都出席了，但为了表示要落实党中央号召，所以会标没有，剪彩也没有，使得一个重要的艺术活动变得不伦不类。这就是一种跟风。我觉得跟风是我们社会的一个顽疾，很多问题都可以归结到跟风上。现在党中央有这个指令要纠正文风，并提出了一系列具体要求，这一段就发现各种跟风的做法，有时候真是非常可笑。包括作协，每年春节前都举办一次新春联谊会，这本来是作家协会联系作家的方式，作家本来就是分散的，既然说作协是作家之家，是为作家服务，那么在春节前夕用一个联谊会来交流感情，这虽然不能说是最好的方式，但至少还是受大家欢迎的。就因为跟风，今年也要把这种活动取消了。别看现在讨论文风和纠正文风非常热闹，但有些恰恰是在以一种恶劣的文风在讨论文风和纠正文风。

所以我想今天我们谈文风，千万不要把它搞成一个跟风的事情，我们不要跟在政治或文件的后面说些现成的话和现成的词。首先，我们不要把文风当成一种形式主义的东西来对待，以为从形式上改变就可以了。文风看上去是一个形式主义的表现，其实这种形式主义的背后所反映的是思想贫乏的问题，思想的贫乏只能用一种形式主义的东西来掩盖。反过来这种形式主义的东西又会遏制思想的创新，这种形式主义的东西体现在文风上就是党八股、学八股。我觉得现在有一种很严重的学八股，甚至比党八股还要严重，学八股是我们日益僵化的学术体制种下的果实。刚才老孟分析了这种体制下学八股的产生。我要补充的是，生活在这样一种学术体制下，就不得不变得学八股起来，因为不这样做，就得不到相应的利益，在大学不发表这样的论文就不能评职称，这是很切实的利益问题，是生存问题。但是从我们主观来反省的话，我们为什么很轻易地跟着这样一种文风走，跟着这种学八股走呢？是因为我们缺乏一种充满生命力的思想，我们的思想贫乏，只能用这种形式主义的东西掩盖。所以学术界在讨论文风问题时，也要反省我们主观上的原因。因为文风也揭示出我们的学术缺乏一种生机勃勃的思想，真正有活力的思想要表达出来，是任何一种八股都阻止不住的。其实学术界不少人是相当喜欢学八股这种东西的，因为有了学八股，没有思想，或者说也不必去费劲地思想，仍能在学术体制下活得相当滋润。当然还必须看到这种学八股遏制了我们思想的创新，有可能有一些真正有思想活力的年轻学者，就因为陷入到这种文风的陷阱中，思想也就慢慢被腐蚀。这是我想谈的第一点，文风与思想贫乏之间的关系。

第二点，我感觉文风还涉及一个文化领导权的问题。为什么政治家特别是执政的领导者以非常积极的态度谈文风？是因为文风本身涉及领导权的问题。刚才老孟讲到，毛泽东在延安时代为什么那么重视文风问题？老孟认为，“五四”以来的知识分子所创造的启蒙话语，到了延安时代逐渐蜕化成为一种僵化模式，不能有效地解答现实中新的问题，毛泽东要用新的、有活力的话语取代启蒙话语。但我以为，启蒙话语在当时并不是完全过时的话语，只是因为启蒙话语属于知识分子的话语，启蒙话语在确立过程中也确立了知识

分子的话语权。如果认同启蒙话语，也就是认同知识分子对文化的支配和评判。所以毛泽东在延安时代是从无产阶级文化领导权的角度来看待知识分子的言说方式的，他找到了一个非常适当的切入方式，这就是文风问题。今天回过头看延安整风，我觉得当时在延安的知识分子并不是在文风上有多么严重的问题，症结在于他们在思想和立场上还不能符合党的要求，也就是一个如何与延安的革命以及人民相结合的问题。知识分子的启蒙话语并不能很好地解决这个问题，当然，延安时代的整顿文风不仅是要解决知识分子的问题，更为重要的是反对党八股。反对党八股虽然看上去是一个文风问题，但它同样涉及到文化领导权，涉及是由执洋教条的人来领导革命，还是由从中国土办法出发的人来领导革命。正因为文风关涉到一个文化领导权问题，所以我也非常理解十八大以后为什么习近平要提出文风问题。我也很欣赏他的提法，这种提法是不是暗示着，新的领导班子会在政治上有新的举动，我倒是很期待。因为这一套文风以及所伴随的整个官场上的形式主义问题，已经变成了能否在官场上站住脚的筹码，要学会这一套文风，要擅长这一套形式主义的东西，才能在官场上混下去，而这种东西也遏制了一些有创造力的、真正在政治上有所作为的人。今天越来越僵化的学八股，也涉及一个文化领导权的问题。尽管学八股危害越来越大，但我认为，在大量的按照学八股样式制造出来的文章包围下，仍然存在一些生机勃勃的文章。只不过这种生机勃勃的文章，很难得到体制承认，已经被体制化了的那些刊物也不愿意刊登这些生机勃勃的文章。为什么？就因为他们要这样做的话，就会感到领导权有丧失的危险。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他们一方面看到学八股的文风对学术发展的约束，另一方面又不敢刊用那些真正有思想也有创造力的、生机勃勃的文章。在我们身边这种文章还是存在的，也许这些文章发在非核心、非权威的刊物上，发在一些游离于体制约束的刊物上，也许更多是发在网络上。这也说明一个问题，如果一个人有自己的思想、有生机勃勃的创造力，就不会被这种学八股所约束，哪怕他按照一定格式写，这种格式也禁锢不了他的思想。所以纠正文风一定不要纠缠于形式，特别不要止于形式。比方说，反对学八股，并不在于我们写文章要不要写主题词，要不要有引文。其实说到底，假如真的有思想的话，形式不过是一个载体而已；假如没思想，就会被形式所统领。我觉得这可能也是一个很关键的问题。我先说这些。

李云雷：贺老师讲的几个问题都很重要。学八股造成思想的贫乏，文风与文化领导权的关系，还有谈到不要跟风。其实我们也注意到，“走转改”这个活动，基本上是在新闻领域展开的，学术界、文学界基本上没谈这些问题，我们觉得这个问题挺重要的，尤其是我们看到很多论文都是不知所云，特别是学术杂志上这样的文章很多，所以跟祝老师商量讨论这样一个题目。

祝东力（中国艺术研究院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所）：刚才听两位老师讲特别有启发，我接着说两句。文风问题，是横跨中国现代文学史、思想史、政治史的一个特别重要

的问题，在中国现代历史上，很少有一个概念能覆盖这么广泛的范围，而且周期性不断地出现。比如说五四新文化运动同时也是白话文运动，像胡适、陈独秀都很尖锐地提出过文风问题；然后是延安时期的毛泽东，一直到我们今天，像中央最近提出的八项规定，其实有两条都直接和文风有关，像开短会、讲短话，力戒空话、套话等等。这个话题在中国近百年的历史上周期性地出现，特别是在中共党内，这其实也说明中国共产党是一个理论党，一个由哲学社会科学理论指导的党，我们很难设想美国共和党、民主党，日本自民党，能这样尖锐地提出改进文风的问题。文风问题非常重要，可另一方面，又很少有人研究。我们查阅资料，比如在期刊杂志上，标题中包含“文风”的文章，粗略估算，80%是研究古典文学的，比如说晚唐政治与文风，15%是讲新闻行业的文风问题，还有5%是莫名其妙不知道谈什么，真正从理论上正面地深入讨论文风问题的几乎没有。刚才讲，这是一个横跨面这么广泛、周期性出现的重要问题，但恰恰缺少研究，这也反映了我们学术界在文风、学风上确实有严重的问题。

从概念上讲，什么是文风？最粗略地下一个定义，就是行文的一种作风。不是风格，因为风格无所谓优劣，风格是“二十四品”，雄浑、淡泊都是风格，无所谓高下，但作风有高下优劣。从历史上讲，五四白话文运动第一次正面提出文风问题，像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讲文学八事，第一个就说“需言之有物”，第二个是“不模仿古人”，第四个“不作无病之呻吟”，都是正面讲文风问题。当时的社会背景是这样，大清亡了，科举制也早废了，原来承载文言的那个社会群体，就是士大夫阶层已经消失了，这时候文言成了一种语言僵尸，但是它在书面语言领域仍然占据霸主地位，这不正常。而这个时候，知识分子已经换代了，从士大夫阶层转换成留学生群体，以他们为主体形成新型的现代知识分子，在语言上一定要变革。但是，这个以留学生为主体的知识分子群体，在白话取代言文之后，又出现了一个新的情况，就是洋八股问题，毛主席在《反对党八股》里特别强调“党八股也就是一种洋八股”。一方面，他是针对“五四”以来启蒙运动的偏差，另一方面也是针对第三国际的洋教条对中国革命的干扰。毛泽东第一次谈文风问题，是在1938年9月六届六中全会上，那几句名言都熟悉：“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六届六中主要针对王明，当时王明回国，肩负着第三国际的使命，第三国际认为，搞国共合作，那些和南京政府打了十年仗的人很难转过这个弯子来，必须要了解国际局势、有朝气、有新思想的同志回去做指导，这样的同志就是王明。王明回国，对当时抗战工作形成了很大干扰。所以当时的文风问题，是和党的领导权问题联系在一起的。到延安整风时期，情况同样如此，当时整“三风”，学风指思想，党风指组织，文风指行文讲话。从延安整风开始，奠定了一种新的文体，可以叫做毛泽东文体。我记得多年前《读书》杂志上龚育之写过一篇文章《毛与胡适》，说胡适讲过，共产党里面写白话文最好的就是毛泽东。我们今

天读毛选，那些文章还是那么生动活泼、酣畅淋漓。毛文体应该说影响了几代知识分子，按李泽厚在《中国近代思想史》里的说法，至少三代：从抗战初期登上历史舞台的“三八式的一代”，到40—50年代“解放的一代”，再到“文革”中的“红卫兵的一代”，都深受毛泽东文体的影响。但是，这种文体经过几十年发展演变，也出现了程式化、泡沫化的现象，最极端的表现就是“文革”时期的大字报，大字报的特点是以势压人、盛气凌人，重立场、重结论，轻事实、轻逻辑。这种文风到“文革”后期已经让大家深恶痛绝，所以“文革”结束后，“新时期”一开始，文风呈现出一股清新之气。但是，刚才孟老师也提到，我觉得是到20世纪80年代后期，“八五”新潮之后，文学研究、文艺研究、文化研究乃至人文学科领域，又开始出现一种新的洋八股，一直持续到今天。那些学术垃圾可以不必谈，就讲那些最著名的、影响最大的学者，往往也都是洋八股习气非常严重。而其中的原因，我觉得就是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冷战失败，造成了中国知识分子的文化自信严重丧失。我们写文章的时候，其实心目当中总是或隐或显有一个范文，有一个样板间，而上述那些学者，他们心目中好文章的范本多半是欧洲学者、美国学者，有多少人模仿海德格尔说话？有多少人模仿罗兰·巴尔特说话？洋八股的根源是洋教条，洋教条的根源是文化自信的丧失。所以，要改进我们的文风，首先一个前提，就是要恢复我们作为一个汉语写作者的文化自信，这是首要的问题。

李云雷：祝老师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延安整风一直到现在，做了一个很细致的梳理，并且对“毛文体”的演变有一个辩证的历史的分析，我觉得很受启发，王院长您讲讲。

王能宪（中国艺术研究院）：听了几位讲了之后还是很有启发。绍俊兄说我们跟风，不是批评我们，他是说现在中央的八项新规这肯定是好事，我们来组织这样一场研讨也是好事，但是社会上确实有那种盲目的、庸俗化的、简单化的跟风，那些是要不得的。我最近写了一篇文章，题目叫做《礼义之邦考辨》，是为去年底在澳大利亚墨尔本召开的“中华文化21世纪国际论坛”第七次国际会议提交的一篇论文。这个文章谈什么呢？就是我发现“礼义之邦”很多人用错了，写成了“礼仪之邦”，加了一个单立人。我注意到这个问题，后来查了很多文献，结果发现，古籍当中没有一处使用“礼仪之邦”的。这个“义”和“仪”差别可大了，天壤之别。

贺绍俊：那您查到流毒最开始是从哪？

王能宪：查不到，但是就这样莫名其妙的错着。

贺绍俊：1980年以来，报纸上多半都写成礼仪之邦了。

王能宪：是啊，你到百度去查礼义之邦，输入这个词条，莫名其妙地跳出一行字来，“你要查的是不是礼仪之邦”，用黑体提醒你。而且“礼义之邦”这个词条下面大概是70万条检索项，其中大部分实际上是“礼仪之邦”混杂其间。而你输入“礼仪之邦”，检索项竟高达600多万项。就是说，全社会把这个东西弄错了，从学者的学术论著到报刊网络，各

种媒体，都写成了“礼仪之邦”。我在很多场合提出这个问题，有一次在全国政协一个座谈会上我发言。当时北大的金开诚老师也在场，我就提出这个问题向他请教。他也认为“礼仪之邦”肯定是错的，他说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是不是因为繁体字和简化字的转换搞错了呢？我想了想，觉得还不是这个原因，“义”和“仪”是两个不一样概念的字。在墨尔本的会上，我简单把我文章的观点说了说，会后引起了强烈反响。中华文化研究会许嘉璐会长说，你提出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很多人都没认识到错了，而且他也认为我的考证是对的。《光明日报》国学版的主编，要我压缩一下给他，很快就发表了。第二期的《文艺研究》将会全文刊登。我为什么想到这个文章呢？我想这是一个学风和文风的问题。你刚刚说为什么跟风，是思想的空虚，我认为导致这样的一种浮躁的文风，就是缺乏独立的思考、独立的思想。连想都不去想，就这么你错我错，大家跟着错。这样一个词语的误用，也是一个时代风气的折射。

今天我们讨论文风问题，确实是有意義的。十八大之后，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提出八项新的规定。实际上这种新风从习近平总书记当选之后，在第一次和中外记者的见面会，新的风气、新的文风，从那篇讲话就开始了。文风的问题，与党风、政风、学风、会风，乃至民风是紧密相连的，是相互影响的。确实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风，刚刚几位都谈到了，老孟说我们这样一个时代，每天各种杂志报纸、各种媒体，刊登出来的各种文章真是不计其数。我们的文件会议，真是文山会海，这些东西里面真正有价值的、有真知灼见的有多少？真是令人感到，身在其中，已经麻木不仁了！所以新一届领导集体，带来这样一股新的风气、新的面貌，让我们感到很振奋。

我们到台湾去，注意到台湾的领导人、台湾的官员，除了非常正式的场合一般都是即席讲话，没有谁念稿子。而我们的领导干部，离开稿子就讲不了话，这当然不是说我们的领导干部比他们的文化修养要低多少。这里面也有一个文风、学风的问题。确实，台湾的官员很多都是从欧美学成回来的博士，文化修养、文化素质确实比较高。我们现在的领导干部许多也都是博士，但是形成了这样一种风气、制度、传统，官员们不愿自己去独立思考，去写稿子，都是写作班子给他写好了，秘书给他写好了，甚至连秘书也不写稿子了。当然这也有另一方面的原因，就是不能过多地发表自己个人的见解，保持一致，不允许去表现个人的魅力、见解，这可能也是一个原因。但是，这一次我感觉就不一样了。习近平同志、李克强同志召开各方面的座谈会，或者到地方调研，不允许念稿子了，就要谈真实的想法。我感到，党中央重视文风问题，有很深刻、很重要的意义。

李云雷：谢谢王院长，王院长讲的很丰富，从他自己的文章，联系到党风、政风、民风和文风，各个方面，包括台湾的经验，和我们新一届中央领导新的作风的建立等。

张慧瑜（中国艺术研究院电影电视艺术研究所）：对于“当前文化语境中的文风问题”这个话题，我以前没有思考过，文风、党风、作风作为一种特定的政治话语是否依然有效，

这本身就是一个问题。刚才听了几位师长的发言，很受启发，也大致知道这里的“文风”不仅是指文章作法、学术写作方式，更是20世纪中国政治及革命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个意义上，文风是思考、理解20世纪中国革命的路径之一。我主要说两个问题，一个是结合发来的阅读文章来看文风与20世纪中国的关系，二是文风问题与描述当下中国社会的关系。

第一，在这次佳山发来的论坛通知中有一段会议缘起，非常清晰地提到了这样三个不同的时代：一是1919年五四新文化运动，二是1942年延安整风运动，三是2011年开始的“走转改”运动。如果说“五四”是一战结束之后反帝背景下展开的思想文化运动，那么延安整风则是抗战进入相持阶段身在西北的共产党进行的党内自我清理与改造运动，成为建国后一系列政治社会运动的先导，而2011年的“走转改”则是在中国经济崛起、社会问题频发的背景下号召新闻工作者落实党的群众路线。从1919到1942再到2011，这样三个不同性质、背景、出发点的运动放置在一起，构成我们今天讨论文风问题的前提。

第一篇文章是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发表于《新青年》1917年第2卷上，这篇文章被认为是白话文运动以及“五四”“文学革命”的标志，胡适发表这篇文章时还是一名年轻的留学生，《新青年》也是一本刚创刊的知识分子同仁刊物。我的问题是为何胡适这样的新型知识分子以及《新青年》杂志会产生如此之大的影响。这恐怕就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意义使然，如果说1911年的辛亥革命在政治上改变了中国社会，那么五四运动则用一种新的文化实践使得此后的中国发生了巨大的转变，当然，与白话文运动同时发生的则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不过，五四文化运动的后果还在于使得现代知识分子与20世纪中国革命及政治密切结合起来，不管是写文章，还是投身革命，这些废除科举之后的新型知识分子登上了历史舞台，与此同时，文化与政治也成为20世纪中国革命的两个关键词。

第二篇文章是毛泽东的《反对党八股》，是1942年2月8日在延安干部大会上的讲话。在同时期的文章《整顿党的作风》中毛泽东清楚地指出：“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这就是我们的任务。”这是延安整风的基本任务。在《反对党八股》中，毛泽东指出了延安整风与五四运动的关系，“从历史来看，党八股是对于五四运动的一个反动”。其实，延安整风有两个批评对象，一是面对来自莫斯科共产国际的普世价值，提出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化的问题，二是面对从国统区来延安的新知识分子或小资产阶级，提出要与中国最大多数的人民即工农兵相结合的问题。与胡适不同，40年代的毛泽东不仅是党的领袖，而且也是理论上的权威。通过整风运动来改造共产党自身的品格和性质也是一种新的政治、文化实践的方式，直到建国后这种思想文化运动从党内扩大为全社会参与的运动，“文革”也是以这样的方式发动的。

第三篇是李陀老师写的《汪曾祺与现代汉语写作——兼谈毛文体》，发表在《今天》1997年第四期上，这之前李陀还写过《丁玲不简单——毛体制下知识分子在话语生产中

的复杂角色》，也发表在《今天》1993年第3期。李陀作为知识分子、《今天》作为20世纪80年代初期以发表朦胧诗而参与到20世纪80年代启蒙运动中的同仁刊物，似乎历史又重新回到了胡适和《新青年》时代，两个时代所采取的文化革新的方式都是相似的，正如朦胧诗本身是一种以语言朦胧化的策略来对抗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的政治话语。李陀把毛泽东对知识分子的影响归纳为毛文体，并试图呈现这种话语实践与其说是强迫知识分子接受毛文体，不如说也有知识分子主动接受的成分，因为20世纪40年代延安整风中所形成的毛文体本身是五四白话文运动、20世纪30年代大众语运动的产物。问题在于毛文体在文革后期逐渐走向僵化，直到最终瓦解。这也就为我们理解2011年“走转改”提供了重要背景，就是在毛文体失效以及中国社会结构发生深刻变化的时代，如何使“走转改”不变成新的形式主义、新的套话？

第二，现在的文风之所以会出现问题，我觉得是因为出现了一种言不及物、词不达意的现象，就是说无法描述真实的经验，一种作为共识的阐释方式出现了问题，描述与现实出现脱节，这个问题恐怕是20世纪80年代、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始终存在的，我们究竟是借他人的酒杯浇自己的块垒呢，还是继续旧瓶装新酒？其实，文风背后是如何理解、描述当下中国的问题，我举两个刚看到的现象。

一个是第23部007电影正在中国上映，叫《007大破天幕危机》。有意思的是，007一出场就被自己人杀死，陷入危机之中。而其中最为重要的场景就是大俯拍之中的上海外滩，很像20世纪的纽约曼哈顿城，高楼林立、流光溢彩，呈现了一个新型资本主义国家的崛起。与此相参照的是007及其所属的英国的衰落。当然，日不落帝国在二战之后就已经衰落了，这部电影中的007很显然是金融危机下西方社会的隐喻。最终007寻找自信、打败敌人的方式，就是不断地往后推，回归过去，回到他出生的老别墅，穿过英国17世纪宗教改革留下的地道，最后才勉强获胜。这部电影的意义在于，当下的中国在西方大众文化之中开始被表述为一个与西方没有差异的新兴国家。

第二个现象就是近期央视媒体集中报道农民工讨薪难的问题，并且评论员发出这样的评论，说2003年温总理已经替农民工讨工钱了，为什么10年之后讨薪之路依然艰难，还有没有出路？暂且不说农民工如何讨回工钱，从这件事可以看到当下中国的另一面，相比007电影所呈现的21世纪高度发达的中国，农民工拿不到工资的现象很像19世纪工业革命初期的状况，一个连劳动者的正常薪水都无法保障的时代，这是马克思、狄更斯、雨果、托尔斯泰等19世纪批判现实主义作家笔下的现象，正如《悲惨世界》中法律根本无法保障穷人的基本权益。

由此，可以看出当下中国处在一种很荒诞但又很真实的状态，一只脚已经迈到了21世纪，另一脚还停留在19世纪，步子迈得有点大。其实，这两个现象又是互为因果的，或者说经济发展带来的异常绚烂的摩天大楼与资本主义发展对劳动力的压榨是同时并存的。

中国的双重景观在全球化时代并不是特例，发达国家有大量处在社会底层的非法移民，而第三世界也出现了与第一世界相似的后工业大都市。如何用新的语言、新的认识世界的方式来描述当下中国，确实是一个很重要的挑战，当然，这也为语言 and 理论创新提供了契机。我大概就讲这些。

王磊（中国艺术研究院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所）：我觉得刚才祝老师把文风问题和文化自信问题联系在一起，触及到文风问题的一个根源。可以说自“五四”以来，文风的转变和文化自信密切相关。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到延安整风再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我们的文化其实有一个上升的过程，也是一个从不自信到自信的过程。但是自20世纪80年代以后，这种自信又开始瓦解。

我们今天的文风，是学风的体现，而我们今天的学风又是当代文化界、文艺界以及知识界思想状况的一个反映。我们今天的思想状况，学术、学科体制，很大程度上是文化不自信的表现，是新时期以来重新向欧美看、与西方“接轨”的结果。我觉得这种文化上的不自信、言必谈希腊的思想状况，直接导致我们在学风和文风上的一些不良现象。比如追求学术论文在形式、方法和概念上的“华丽”；过分强调所谓学术规范，且规范的标准是清一色的欧美标准；这就致使“学院八股”、“洋八股”盛行，也导致从学院体制中学习出来的青年学者和博士硕士们迷失在学术八股文中，没有自觉的反思意识和问题意识。今天我们谈学风问题对年轻的博士硕士们非常有意义，对于学术风气的改变，会有一个比较大的刺激。我觉得提给年轻学者的一个根本的问题，就是怎样面对现实生活以及现实的文艺、文化现象中出现的一些真问题，以及怎么去解决这些问题。我想如果一种思想观念是冲着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去的，那么这种思想意识、思想观念一定是朴实的，假如我们用一种比较朴实的思想观念去做文章、去论证问题，那他的文风一定也是朴实的。归根结底，能不能发现问题，能不能抛开那些华丽的概念和形式去考察和解决问题，归根结底还是一个文化自信和学术自信的问题，这是青年学者的重任。这是我想谈的。

李云雷：王磊跟慧瑜谈的挺好，王磊谈文化自信以及青年人如何发现问题，我觉得这是青年人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现在很多青年还都跟在别人后面，说别人的话，想别人的事，青年人应该独立地发现、提出自己的问题，然后去解决，这样才能真正地面对这个世界，新的文风或学风才有可能形成。慧瑜结合这三篇文章，谈了对当下中国现实这样一种分裂状态的理解，并从文风角度来看，他提出不知道用什么文风能描述中国这样大的差异与变化，我觉得这个问题很值得我们思考。

鲁太光（中国作协《小说选刊》杂志社）：我先给大家讲个笑话，然后再谈点儿感想，跟“中央八条”有关，讲文风的。我一个特别好的朋友在老家一个政府部门当二把手，前段时间跟他单位的一把手来北京开会。孔夫子不是说过“有朋自远方来，不亦说乎”吗，朋友到的当晚我请他吃饭，我怕他第二天有事，就问他能不能喝酒。他说，我已经问了，